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擺脫束縛的都市經驗與文化：珠江三角洲農民工家庭研究

Urban Experience, Urbanism and Liberation: A Study of the Peasant Worker Famil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oi:10.6752/JCS.200803_(6).0008

文化研究, (6),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2008

作者/Author：葉蔭聰(Iam Chong Ip)

頁數/Page：195-2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Urban Experience, Urbanism and Liberation:
A Study of the Peasant Worker Famil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am Chong Ip

擺脫束縛的都市經驗與文化：
珠江三角洲農民工家庭研究

葉蔭聰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
電子信箱：chong@ln.edu.hk

投稿日期：2007年8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2008年2月18日。

摘要

當代中國由80年代初經濟改革開始，經歷激烈的社會變動，一些學者把這些有目共睹的觀察推進一步，討論在這些變化裡，是否有新的社會連結及政治意涵。一些人把政治熱情與幻想投注在擴張中的私營經濟部門，預言新的政治變動，其他人則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政治機遇不感樂觀，他們認為，各類新興的社會團體十分政治化，並視之為一種「逃避主義」。

本文以幾個珠江三角洲的外來農民工家庭個案為重心，說明及探討這些工人在新的家居領域中的生活經驗；由於大部分工人住進工廠宿舍，而絕大部分工廠宿舍進行男女分隔，所以部分已婚男女民工會在工廠外租房子，與伴侶（已婚或未婚）建立臨時的親密居所，而由此衍生各類社會網絡與活動。

本文嘗試超越把家庭視作「自然單元」的觀點，接合上近年研究家居領域的理論，視「家」為一組生活關係、想像空間、領域的集合體，「家」不是簡單地根著於一個地點的物理與社會單位，或一個家庭的容器，它是一處陷於各種張力的地方，包括定居與遷徙，本地實踐與全球力量，是資本主義重新編織權力關係的過程，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弱勢者在日常生活中努力逃避開權力關係。對民工來說，工廠生涯的解放經驗不多，反而是為了一嘗現代生活及獲取經濟回報的自願囚牢，但不少人仍無法透過工廠生涯中找到相對安穩的工人階級生活，工廠的生產關係並沒有帶來工人階級家庭，相反地，農民工再次企圖擺脫自己的工人身分，嘗試從桎梏中逃離出來，創造自己的空間逃逸出政治經濟的羅網，維繫夫妻親密關係，享受同鄉及家庭生活，追求社會身分的上升，用他們自己的方法重新界定都市生活。

關鍵詞：中國大陸、珠江三角洲、農民工、階級、都市生活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1980s,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dramatic change. Most researchers of China studies are concerned with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association and politics. Among them, some even feel passionate and have fantasy about the ever-expanding private sector and then predict new political changes. Others feel pess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economy and see most emerging social groups as a kind of political "escapism".

This article, with focus on several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plores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these working people's home territories. While most live in factory dormitories segregated by sexes, some workers, particularly those married, live in rental houses and build up their temporary homes outside factories. Various social networks and activities are derived from these spac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o beyond the view of family and home as a natural unit. It borrows the recent theories about domestic domain and sees "home" as a set of lived relation, imaginary space and territories. It is not simply a physical unit rooted in a locality or a container of family; instead, it is a locality situated in a variety of tensions including settlement and displacement, local practices and global forces,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part of the process of making power relations in capitalism. The most noteworthy is how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tries to evade power relations in everyday life. For peasant workers, factory life is less an emancipation than a price they pay for enjoying modern life and gaining economic reward. Yet many workers could not enjoy lives of stability in their new families.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in factory does not bring working class family to them. They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eir identity of worker and escape from politico-economic constraints to create their own spaces in which they have conjugal intimacy, build up co-villager network, maintain familial life and pursue social mobility. In other words, they define urbanism in their own ways.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Pearl River Delta, rural migrant worker, class, urbanism

一、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社會、家

(一) 市場社會

當代中國經過8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引發出巨大的社會政治生活的轉變，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這些轉變影響了全中國人民，農村的農民獲取承包制下的土地，以及進入地方市場的機會；城市裡的居民，他們的衣食住行，從依賴單位的再分配系統，轉變為商品市場，他們目睹了深刻而劇烈的變化。一些學者把這些有目共睹的觀察推進一步，討論在這些變化裡是否存在新的社會連結(social association)及政治意涵(Davis 2000; Solinger 1999; Strand 1995)。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聯的崩潰與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更進一步激發出人們各種政治想像，包括公民社會的復興與對抗國家權力的公共領域的出現。然而在中國，自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受北京政府鎮壓後，雖然一些自發與零星的社會抗爭仍然時有所聞，例如下崗工人的抗議、農民上訪¹、法輪功等等，但是，並沒有大型或戲劇性的政治變革在這段期間發生過。在這種態勢下，一些人繼續把政治熱情與幻想投注在擴張中的私營經濟部門，預言不久的將來會發生政治變動(Davis 2000; Solinger 1991)，其他人則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政治機遇不感樂觀，他們指出，各類新興的社會團體顯得非政治化，不過是一種逃避主義(escapism)(Chamberlain 1993; Wakeman 1993)。

這些想像或多或少受著社會主義國家市場過渡(market transition)的理論前提影響。1978年後，官方鼓勵及鼓吹市場化，學術界以至於一般輿論視之為對幾十年來蘇聯及毛澤東式社會主義建設的告別，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亦被置放在蘇聯、東歐的市場改革背景中考察，經過20多年的變遷，中國經濟較發達的城市被視為邁向或已經是「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了，「市場社會」被理解為一個開放

1 「上訪」指不同地方群體往政府的信訪部門陳情，一般各級政府機關皆有信訪部門，接待上訪的民眾，特別是省、市及中央級，而最多人上訪的機關應該算是北京的國家信訪局。

空間，空間內的社會及政治活動逐漸免受國家干預(Rowe 1984, 1989; Solinger 1999: 288)，而個人亦逐漸取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以及自由，這種自主自由，是形成政治力量的潛力。

大部分對當代中國社會連結的研究，都沿用「自由市場－公民社會」的概念，甚至借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概念，即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tic)傳統的公共領域(Habermas 1989)。不過，近年對公民領域的理論反省，已開始質疑這個概念對理解歐洲社會是否有效，至於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社會更不用多說了，公共領域已不再被視為具普遍意義的歷史目標，更不是自然發展出來的制度安排。在歐洲的背景中，布爾喬亞階級宣稱的普遍理性(universal rationality)也漸受質疑，它的構成(formation)不單被重新概念化，而且被視為啓蒙時代的階級及性別身分的形成過程(making)，是一個社會－歷史地理(socio-historical geography)構成。例如，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實踐，賦予布爾喬亞階級成為資產擁有者，取得合理及合法的公共身分並排斥無資產者，同時，為社會空間定下想像界線，劃分公共世界並與布爾喬亞家庭的私人領域形成區別與區隔(Fraser 1989; Landes 1988; Negt and Kluge 1993)。在非歐洲的背景中，亦有學者提出進一步的質問，卡鴻(Craig Calhoun)認為，從「public」一詞的現代中文翻譯裡，可以看到「公」一詞在早期現代中國的特殊意義，與歐洲的政治公共理性並不相同，晚清以降建構「公共」的城市商人及菁英，不能等同於歐洲的布爾喬亞階級，其合法性的構成，需要進一步釐清(Craig 1997)；恰塔吉(Partha Chatterjee)研究印度的當代宗教及政治時指出，西方政治學的公民社會無法說明印度的政治文化動力，許多民間力量並不以「公民」身分及政治理性作為合法性，他提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這個概念來理解後殖民的印度(Chatterjee 2000)。

這些理論反省提醒我們，有必要研究個人或集體如何進入新的社會角色，構成社會連結，形成城市空間及都市文化，特別是公共與私人領域的邊界又如何出現及維持。因此，所謂的「市場社會」，並無普遍的社會內涵，它的意義需要在各種具體歷史情景與獨特群體之中界定清楚。要理解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社會意涵，回到南中國珠江

三角洲的脈絡去考察是一個重要選擇。

中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現象之一，是沿海省分工業城鎮與城市的出現，它們亦是鄧小平上台率先鼓勵發展的地區，例如今天的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已被譽為「世界工廠」(world factory)，國營企業很少，相反地，其他各類資本產權結構，包括地方集體企業、私營工廠、跨國公司、合資企業等等同時存在。開放改革的政策之一，是鼓勵經濟發展，並下放權力予地方政府，就以本研究的田野地點S鎮所處的東莞市，不單是市中心，甚至附近的鎮及村級，也可以招商引資，因此不單東莞市及各鎮中心吸引資本，大量投資項目及企業亦散佈在農村，形成過去20多年來農村的工業化及城市化，亦即中國大陸稱之為「遍地開花」的局面，亦看到所謂「邊緣城市地帶」的城市化過程。

若從勞工來看，珠江三角洲有充足、流動性高與富彈性的農民，源源不絕從內陸省分湧進，構成城市人口的大多數。因此若僅以「城鎮居民」人數來計算，城市化速度不算非常急速。因為不管城鎮居民的自然增長，還是再加上一些原來農村地區轉變成城市的戶口轉換，也不及暫住人口。以東莞為例，本地戶籍人口數量及增長率遠遠比不上外來人口，根據官方數字，在1995年以後，外來暫住人口已超出本地人口，1999年本地人口只有150萬左右，比外地人口少90多萬，實際外來暫住人口數字更大。根據統計，2004年東莞市外來人口中來自廣東省的有747,804人，來自廣東省以外的有4,096,599人；這些外來人口大部分成為工業勞動大軍。據估計，2006年暫住人口加上沒有登記的流動人口超過800萬，東莞已成為千萬人口城市。選擇位於東莞市的S鎮作為研究地點，是因為該市的大量外來人口，具有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的特色，而它的生產總值及工業生產總值在珠江三角洲亦是數一數二，2005年生產總值超過2,181億，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排名第四，僅次於廣州、深圳及佛山（廣東省統計局2006：107），是「世界工廠」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區域。

巨大的資本與勞動力帶來急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學者已開始從生產要素或人口的地理聚集與分佈來研究這個區域的城市化(Lim

1997, 2001; Sit and Yang 1997)，然而，民工如何進入新的社會角色，以至於帶來什麼形式的都市生活(urbanism)及都市社會，仍然有待指認、界定與理論化。

本文所研究的農民工所構成的社會連結，亦只是剛開始成為研究焦點，現時大部分研究仍集中在工廠體制政治(Pun 2005; Lee 1998)，珠江三角洲工廠多提供（甚至要求）工人住進工廠宿舍，工廠的林立亦成為這一區域的城市特徵。然而，根據陳佩華等人的研究指出，這種工廠體制大大限制了工人在工業城鎮的組織及團結(Chan and Wang 2005)；農民工以跨越城鄉的流動網絡，進入新興工業城鎮，其空間實踐的可能性，受到工廠制度及地方政府管治體制的限制，其親屬同鄉的關係以及城鄉的對立得以強化與複製，既打造了他們沒有公民權身分的「打工仔／女」主體，亦呼應了新的霸權(hegemony)，支撐著一種具有社會及歷史特性的生產模式。

然而本文將會進一步指出，他們作為行動主體，並不完全臣服，而是不斷努力突破限制，生產社會空間。工業生產及其制度固然是推動珠江三角洲「市場社會」的重要力量，然而，正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工業革命所牽引出的「社會」，並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被「市場」激發出來的。各種建造「市場」的國家制度政策，以至於為市場而存在的生產關係，把勞動、土地與金錢商品化，生計被摧殘的勞動階級為了進行自我保護，形成並以「社會」的名義作為抵抗。

博蘭尼的分析，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化約論，他反過來指出，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並不直接導致階級鬥爭，換言之，社會關係不能由生產關係所取代，階級的鬥爭與矛盾以「社會自我保護」作為中介，並以其名義進行，成為「主動社會」(active society)(Polanyi 1957)。近年的學者對博蘭尼的歷史分析作出不少修正與補充，湯普遜(E. P. Thompson)指出道德經濟是早期階級鬥爭的基礎，階級團結並不全是市場的後果(Thompson 1968)；森瑪斯(Margaret Somers)指出，在十九世紀訂立及廢除《史賓漢法》(*Speenhamland Act*)之前，即全面推動自由勞動市場前，英國早已存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社群，他們才是

後來形成廣泛的社會公民權的制度基礎(Somers 1993)。由此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生產關係固然重要，但是這些關係皆鑲嵌在市場與社會的制度化過程中。

十九世紀的英國，與今天的南中國珠江三角洲固然有許多不同，但是博蘭尼及後繼者的討論讓我們明白，市場固然是制定諸多政策及制度的過程，社會亦如是，需要從主體實踐及集體能動性(agency)才能理解「社會」，主體性不能由市場原則所完全決定，從中我們看到構成「社會」的各種異質力量，而市場制度的打造並不能決定一切，它透過工業生產關係以及城市文化形成一個舞台(Burawoy 2003: 223)，讓社會階級進行鬥爭及構成團結。

研究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社會群體的關係，在社會科學裡有兩大的取徑，一為齊美爾(George Simmel)以至於芝加哥學派、一為馬克思主義。前者較注重現代都市的新空間及社會關係，後者較注重由生產關係延伸出來的社會關係。齊美爾面對十九世紀末的歐洲都會變動，他從金錢的現代性出發，以辯證的角度闡述現代人的新處境：都會生活一方面帶來個體性自由，金錢的交易邏輯讓人擺脫各種傳統束縛，進行更多的功能性交往；但另一方面，由於工商業及人群頻繁的形式化交往，產生大量密集又繁雜的感官刺激，帶來心靈的過度負荷，個體為了抒解這種壓力而發展了一種應對方式，對外界以及別人採取漠然或所謂都市厭棄(blasé urbanite)的態度。反過來，形成及加劇了個體化的(individualized)心理取向，以及人們連結的方式。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學者沃斯(Louis Wirth)，更進一步以生態因素界定城市——即數量、密度及差異性——從而解釋城市中個體交往取向以及社會連結的形式(Wirth 1938)。

馬克思的關注點以工廠制度及生產關係為主，分析單位主要是社會關係及社會主體。他指出，資本主義帶來階級成員在工廠及工人社區的聚集，是生產社會化在空間上的表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遜嘗試修正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還原論(economic reductionism)，他指出，階級構成並不遵從機械與進化的歷史途徑或特定的理論結構，它是具體脈絡之下的文化與政治構成(Thompson 1968: 10)，人們不單

在生產關係「活出」(live out)他們的社會連結，其他如消費、家庭、政治組織、宗教活動等等生活亦然。凱茲尼爾森(Ira Katznelson)嘗試進一步系統化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除呼應湯普遜的歷史及階級經驗取向外，另突出現代城市的兩個政治面向：國家打造(state-making)過程與地方政治(Katznelson 1992)。

綜合兩大取徑，我們可以看到工業—城市化的社會連結，對主體具有解放意義，同時亦是一個政治經濟制度重整的過程。在這兩個過程之間的中介組織及經驗，特別是他們日常生活及其空間，是了解社會連結的重要關鍵，因此本文試以工廠外的民工的「家」作為起點進行討論。

(二)「家」：一個考察的起點

農民進入南中國沿海工業化城鎮，首先進入的空間是親屬同鄉網絡、以至工廠車間及宿舍，部分人則再進入第二個空間，這便是工廠以外的城市居所。本節將集中研究他們的「家」及作為消費領域的家庭生活。「家」是重要的消費空間，具有勞動力再生產的功能，是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社會關係的重要場所；同時，個體在都市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抽離的單元，總是坐落在具體的社會空間。「家」，不論何種形式，無可避免地是個體長期發展及安身的空間，從經典人類學(classical anthropology)的角度看，家以及家庭作為社會制度，具有特定社會功能，是個體以至於集體適應與應對外在環境的基本單元，由此作為考察點，讓我們可以呈現出城市重要的空間特性(spatiality)，以至於都市空間的社會意義。

由2003年開始，筆者在珠江三角洲S鎮進行民族誌式考察，集中研究外來打工的農民工。本文集中討論的幾個農民工（或農民工出身）的家庭個案，是筆者在考察過程中經過輾轉介紹下認識的，並斷斷續續觀察及訪談了他們約一年多的時間。他們的勞動生涯及社會地位接近，但卻展現出不同型態的「家」，而當中亦有連繫，正好可以由此看到民工的「家」作為社會連結的動態關係。

根據田野考察發現，農民工越來越多在工廠以外的空間生活，

他們建造臨時的「家」，這個「家」與工廠宿舍的男女分隔不同，也不受工廠直接管理，不少已婚及同居男女民工在工廠外的出租房子居住。根據東莞市政府的統計，約有200萬人住在出租屋，占官方統計的外來人口約1/3（《信息時報》2006/4/7）。另有一統計指出，出租單元數目是116萬（《南方都市報》2006/8/22）。跟伴侶建立臨時的親密居所，這是他們部分擺脫工廠對人身控制的一大步，並且由此衍生出較穩定的城市空間領域，讓他們的活動及關係得以較自主地發展。所以，本文便由此作為起點，從民工進入工業城鎮的經歷與經驗裡，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都市文化及社會。本文視他們的家庭消費為日常生活實踐與制度，並嘗試辨認出這個「家」在他們的生活脈絡裡的社會意義。

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城市化的發展，以及它們對所謂「傳統家戶」(traditional household)的影響，是十九世紀古典社會學的經典主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化論主旨。「傳統家戶」的社會—經濟功能很大程度上為核心家庭及現代制度所取代，例如學校、福利國家、工廠、公司等等，「傳統家庭」成為「傳統社會」或「傳統社群」的換喻(metonym)，並作為有關現代性大論述的重要元素。然而，「瓦解論」早為不少論者從經驗及方法論上作出挑戰，部分人質疑大家庭瓦解的預言是否正確，同時點出了家戶策略(household strategy)的重要性，家庭運用各種策略，集體動員家庭的資源，以面對結構性的限制及轉變。他們指出，不應把家庭限定為一微觀功能單位，以適應廣大社會的需要，家庭結構的轉變，決定於戶主的策略(Hareven 1982; Mingione 1988; Pahl 1985)；針對現代核心家庭的說法，後現代論者指出，當代社會裡出現了家庭模式的多元化，部分人更質疑用「家庭」作為分析單位的有效性及其用處(Bernardes 1999, 1993; Scanzoni et al. 1989)；循著相反的方向，某些社會學家持較溫和的觀點，他們認為，雖然家庭模式的確日趨多元化，但核心家庭仍然是人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部分，但他們承認，根據「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劃分來理解家庭生活，是沒有道理的，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家庭轉變如何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發生(Cheal 1993; Noble

1998: 268)。

然而，家庭常被視為一個承載著「文化」或「社會」內容的單元，這已是社會科學界的慣常做法，特別是在人類學之中，民族誌學者通常居於「他者」的家庭之中，從事田野考察，加上早期人類學由於殖民傳統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所以特別關注家庭及相關議題，例如親屬、婚姻、性等等，這構成了這個學科其中的一個主導領域，但是，傳統人類學家及民族誌學者鮮少審視「家庭」在方法學上的性質，以及它的理論意涵。

劉易斯(Oscar Lewis)的都市人類學關注家庭，但他嘗試轉移人類學對「他者」的異國情調式的關注，增加學科對現代社會的敏感度。他提出民族誌現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重新界定家庭，把家庭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儘管他還是從低下階層的家庭生活中辨認出「文化特質」，並建構出「貧窮文化」概念，但是他視家庭及其「文化」作為個人及宏觀結構的交匯點，他視「貧窮文化」為貧窮在個人及集體層次上的社會再生產，他以民族誌來論證，資本主義的結構分析不能取代對階級經驗的理解(Harvey and Reed 1996)。劉易斯在理論及方法上強調社會經驗，並努力嘗試探討結構與主體能動性的動態，並清晰呈現家庭生活在都市經驗的位置，對理解資本主義非常重要(Borden 2001; Katznelson 1992; Lefebvre 1991; Thompson 1963)。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超越劉易斯視家庭為「自然單位」(natural unit)的想法(Lewis 1959; 1973)，我們不應再僅僅視家庭或家為一個物理空間，或一處由親屬及異性夫妻關係組成的地方，亦不是固定文化區域(culture areas)的載體。本文嘗試把「家」視為一組生活關係、想像空間、領域的集合體，並進入有關家的生活及想像關係，這些關係維繫著一個家居領域，人們由此界定出自己個人及集體的領域界線。這點呼應著當代文化研究的關注，即在結構決定中尋回人類能動性的可能，同時亦彰顯出階級、性別及種族的主體性(Hall 1980; Williams 1983: 134; Willis 1977)。晚近對全球流動的討論，更把「家」不視為一個物質空間或植根在地方上的人群組織，而是一個位於安居及旅遊，在地實踐與全球力量之間的地方構成(locality)(Appadurai 1990; Clifford

1997; Crang 1998; Morley 2000: 13)。

在這個新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及重新概念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民工以及他們的「家」，顯得特別重要及相關。在社會主義中國裡，「農村」（所謂「傳統」）及「都市」（所謂「現代」）的現代主義式二分法，是有點不恰當的，將難以理解過去幾十年的劇烈轉變。「農村」及「都市」不僅是經濟及社會組織的分類或地理上的分隔，也是49年後社會主義政權具體的制度安排，是戶口制度的產物，是福利分配制度的單位，以及兩種不同地方管治的對象，而非現代化進展的兩端(Zhang 2001)。正如秦暉所說，「農民」是一個國家制度安排下的社會身分，而不是職業或社會—經濟階級。因此，農民工雖然在80年代初已被容許在城市生活，但他們還帶著「農民」這個標籤進入工業部門及城市居所，換句話說，一方面，農村家庭並不是「傳統」社會單位，另一方面，把他們視為「傳統／農村社會」與「現代／都市社會」兩極的中間群體，也是不對的(Cheng and Selden 1994；秦暉 2003)。因此，民工在沿海工業城鎮裡建立的家，不管是臨時還是永久，是超越國家行政管治的公民劃分(Solinger 1999)，同時，也是所謂「非國家空間」（項飈 2000；Zhang 2001）的一個基本單位。民工打造家居生活的過程，是新的政治經濟結構及階級構成的劇烈變動，也是他們作為特別的都市居民，體驗及應對現代性的過程。

在本文中，我大致把受訪者分成兩類，一為工人家庭，另一為由民工轉業成小老闆的家庭。他們這些青年男女，皆冒著頗大的風險，付出很大的努力來建立家庭，打造家的空間。本文將要論證，他們並不是傳統理論上的「工人階級家庭」，同時也志不在此；他們不單受到階級的壓迫及剝削，而且在嘗試聚合成穩定的底層階級，安身在一個穩定社區及家庭中亦遇上重重困難。民工家庭正身處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的重重矛盾，民工飽受衝擊的家居領域，正是最好的見證。同時，他們亦非完全順從於這些困難，雖然並不以政治集體行動作出抗爭，但卻努力逃逸出這些制肘與困難，「家」以至於由此組成的都市社會及文化，必須要在這個背景中考察。

二、民工的新居

(一) 家與同鄉聚腳點

10多年前，爲了完成我的碩士課程，我在東莞市C鎮進行田野考察，認識了采花、她的弟弟及其他民工，那時她還是一位不足20歲的單身女性，在一家有1萬多人的工廠裡打工，廠裡大部分員工都跟她相似，他們辛勤工作，爲農村家庭賺取現金收入，同時剛開始體驗城市與工廠生涯不久。她的生活具有「打工妹」的特質，私人生活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工廠宿舍，宿舍被高牆圍著，門口有警衛把守，閒人免進。我跟工廠老闆素未謀面，當然無法進入她的新居，在C鎮，幾乎沒有「田野」可言，只有跟他們相約在裝修殘舊的旅館房間，或在一些本地餐廳裡跟他們作個別訪談。在這些地方裡，他們顯得分外不安，也許是由於他們的農村背景以及飲食口味。

當年完成研究後，我斷斷續續維持跟他們的聯繫，包括書信與探訪。2003年2月，我開始爲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再次進行田野考察。我得知采花與丈夫紅霖在工廠外租了房子，我曾到過他們湖北山區農村的家鄉，但對民工在工業城鎮的「家」一無所知，非常好奇。我到了東莞市S鎮的中井村，到訪采花及她丈夫紅霖的家，他們熱情款待我。那是一間非常殘破的舊瓦房，坐落在當地居民新建樓房後方，顯然是當地村民的舊房子，部分還是當年的小倉庫，甚至是豬圈改建成的，本地村民把這些房子租給外來民工，本地村民的房子則蓋在路旁，包圍著這些舊房子。

S鎮自90年代起經歷著工業化與城市化，根據統計，本地人口少於4萬人，暫住及流動人口超過8萬人，他們構成了當地工業大軍（東莞規劃所 2003）。一位鎮幹部告訴我，非本地人口的統計數字大大被低估了，真實數字大概是20萬人。中井村的土地使用分佈頗爲雜亂，它由幾個小村落（自然村）組成，公路兩旁有一個工業區夾雜了一些新建住宅及外來民工居住的舊式農舍，而且有一條商店街。在采花家附近有一幢祠堂，坐落在村子中間，是本地人祭祀祖先的地方。

出租屋靠近本地人的新居，但外型及居住條件卻形成強烈對比，即使在貧窮的民工看來，也是非常糟糕，他們經常批評這些房子比他們家鄉的豬圈還要差，事實上，部分出租屋以前的確是本地農民的豬圈。有趣的是，本地人與民工住得這麼近，但房屋的類型以及語言之差別是如此清晰，操湖北方言及普通話的采花，從來沒有跟屋主說過半句話，只是偶爾見面點頭打招呼，但他們其實就住在隔壁。

采花與紅霖以月租人民幣70元租了這間沒有隔間的房子，對民工而言，不算很貴，大部分人都負擔得起。在這間不到20平方公尺的房子裡，右邊有一張用幾塊木板砌成的床，左上角放有一台電視，一台VCD放映機及一個瓦斯爐。房子沒有自來水，每天早上或晚上要到祠堂附近的井裡挑水。儘管工廠的工作占去他們大部分餘暇時間，但他們只要有假期，必定留在家裡與老鄉及親戚聚會吃飯。有時訪客太多，瓦斯爐太小，不敷應用，紅霖便在門外巷子用磚塊砌成一個火爐，從工廠貨倉取得一些木板作燃料，就地燒菜做飯。我第一次到訪，紅霖非常驕傲地說，他們非常享受與親友老鄉大吃大喝的時光，並邀請我下次也來參加。

開始的幾次到訪，他為我做好每頓飯，很努力地扮演好東道主，不久我便發現，紅霖在這個家，以至在他們同鄉親戚中，儼如戶主一般。他作為戶主，視我為客人，但他的好客之道，並沒有使我覺得很舒服，因為他們兩夫妻傍晚特地從工廠跑回家，一大清上班前還要到市場買菜。如果沒有客人，他們一般都在廠裡飯堂吃飯。有時，他們還中午離廠，來為我做好午飯。我告訴紅霖，不用這麼熱情招待我，我自己到外面吃便行了，他說：「我也想休息一下，玩一下，不想老是待在工廠。」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他的原因，但在我剛開始田野考察時，他似乎不大放心讓我在村子裡閒逛，他坦言並不喜歡這個村子附近的地方，他也想我留在家中，這是他對待我的唯一策略。此外，我道明來意之後，他還是不大積極介紹朋友讓我認識，他似乎只享受在家裡作戶主，在他的領域裡掌控一切。

他們很少稱自己的房子為「家」，用普通話說，他們也會說「屋子」，這個詞既指稱出租房屋，也是湖北方言中「家」的意思，有時

他們也會說「我那裡」。紅霖說，在外面租房子純粹是爲了「比較好玩」，可以跟老鄉親戚一起聚會，以及「比較方便」，大概是可以過一點夫妻生活。然而，相較起來，這個家有時像一個小型社區中心，多過於夫妻的安樂窩。紅霖的弟弟、采花的弟弟以及他們的堂兄弟、表兄弟，加上一兩位同村好友，平日下班後都會聚在那裡，部分人還有大門鑰匙，他後來還配了一把給我。他們在紅霖及采花家自由出入，白天時更會在他倆的床上睡覺。可以這麼說，圍繞著這個家，有一個以紅霖及采花爲核心的親屬及熟人網絡，這個熟人網絡除了負起互相支援作用之外，其日常活動主要是休息與消遣，例如一起觀看電視、VCD、DVD、打麻將、飯局等等，他們稱之爲「玩」，既指娛樂與聚會，也指沒上班工作的空閒時間，例如睡個午覺。

他們的聚會頗爲男性中心，采花很少邀請她的朋友回家。有天晚上，紅霖邀請了4位朋友回來，有湖北人與河南人，部分是在同一個工廠工作的。他們一起吃晚飯、喝啤酒與打麻將，紅霖花了2個多小時做飯燒菜，共有12道菜，盤子很大，足夠8個男人1個女人一起吃飯，綽綽有餘。我們大汗淋漓，擠在這間小屋裡，卻非常享受。男人不停在抱怨他們的經理與生產組長如何不是，如何無能，根本管不好工廠。我發現，男人總愛發表如何管理工廠的偉論，同時他們也很愛討論地域歧視，例如紅霖與其弟明經常批評經理，說他只會偏袒來自江西的同鄉。同鄉之間的偏袒及對別省的分工人的不公平待遇，經常成爲民工的話題。

（二）消費與金錢

DVD放映機（後來我發現，那其實是一台VCD放映機，只是貼上「DVD」字樣）及電視機，是他們家裡最先進及最新的電器產品，與這個看起來頗爲殘破的家並不匹配，在家裡看電視劇是采花的主要休閒活動，但更多的時候，她會在廠裡宿舍看，因爲廠裡經常加班。一般民工都沒有申請使用需付費的有線電視，只依賴無線訊號，電視訊號並不強，電視機畫面不清，常有雪花狀的干擾。儘管如此，她還是喜歡躲在家裡。其實附近的雜貨店有一台大電視，收到的訊號較強，畫面清晰多了，而且基本上是公開給任何人觀看的。但采花告訴

我，她很少到那家「四川人」的店裡去，她似乎在這間殘破的出租房子裡，仍然感受到一絲溫暖及親切感，雖然她不認為這是真正意義下的「家」。

采花對家裡的DVD或VCD並沒有太大興趣，事實上，他們擁有的只是幾片香港功夫電影光碟、色情片及卡拉OK。沒有男人在我面前看過色情片，好像有點不好意思，但令我驚訝的是，不少男子對卡拉OK很感興趣，但部分卡拉OK其實既不是他們家鄉的方言，也不是普通話，而是閩南語，大概是在台灣製作然後在中國大陸盜版的，畫面都是一些穿著比基尼的性感女郎，扭著腰肢及臀部，唱著像《愛拼才會贏》之類的歌曲。采花的弟弟及堂弟有時會哼著旋律，甚至高聲歌唱，儘管這些光碟也受女性歡迎，但是主要還是男人的娛樂。

雖然與親屬及同鄉等熟人住在一起，采花與紅霖仍然在晚上維持著一定的私人空間，他們也抓緊時間享受兩口子的家庭生活。有時，一星期裡，這對夫妻會有幾晚一起在家裡睡，但在工廠趕貨時，爲了方便，他們各自還是會住在宿舍，好幾個星期都不回來睡。在2003年夏天非典型肺炎(SARS)期間，受到地方政府的指示，工廠老闆都不讓工人離開工廠，他們有1個月沒有回過家睡覺。除了這宗突發事情外，工廠經常加班或要當晚班，這些都是再平常不過的，所以，工廠的時間表完全支配了他們的家庭時間。

2003年非典型肺炎後的暑假，紅霖回家鄉把他6歲的兒子及母親帶回廣東，他們已經有兩年沒有回家鄉見過孩子了，想過一下家庭生活。但這次夏天假期，花了這兩夫妻3,000多元，財政上幾乎負擔不起，但是，他們並沒有太自責，也很享受這段時光，甚至想過是否要讓孩子留在廣東。可是，後來還是打消了念頭，采花說：

我有想過，是否送他（兒子）到本地學校讀書，但是，這次旅費已經這麼貴，如果我兒子與我們住在一塊，我們也許每個月要多花幾百至1千元以上，這對我們來說太多了，我最後還是送他回家，……但是，我問他，你是否明年還要來，他說：「當然要呀！」我相信，他明年也會來廣東過暑假。

我看到許多小孩及年輕人在這兒度暑假，與他們的父母住上幾個

月。根據采花的說法，這已經成爲東莞外來打工家庭的習慣，有兩個原因，第一，許多父母在農曆年不回家，因爲怕春運期間交通擁擠，交通費也貴。暑假期間，交通沒有那麼繁忙，反而是家庭團聚的好時候；第二，一些父母，像采花及紅霖，想讓孩子一嘗廣東生活的滋味，因爲這裡跟家裡「不一樣」，也比較「好玩」。越來越多農村來的民工，像采花及紅霖一樣，跟孩子一起住，但在本地上學是個大問題，財政上的負擔實在太重——沒有本地戶口，學費特別貴，一年差不多要1,700元左右，比起民工家鄉學校4-500元，相差太遠了。雖然聽說部分本地學校裡外地人的孩子數目已超過本地人，但是在我訪問的民工中，可能由於他們太貧困了，只有幾位有送小孩到學校去。孩子在廣東上學，對本地民工來說還是奢侈品，所以廣東地區亦開始像北京那樣，開辦了一些民工子弟學校。

明是紅霖的弟弟，他與女朋友惠珍在2003年6月開了一家水果店，名義上是他們倆的生意，但也慢慢變成有點像家庭生意。采花、紅霖及熟人最初感到非常高興，紅霖與其他親戚借錢出力，讓明脫離了工廠生涯，變成「老闆」。只要他們有空，一定會來協助明及惠珍看店。事實上，水果店完全坐落在紅霖親屬網絡之中，他們晚上下班後，經常來店裡閒聊、幫忙，他們在店旁打牌、玩撲克、吃飯、吃小食，對他們兩夫妻及熟人而言，這已成爲第二個家，也是一個小社群的中心。在2003年底店倒閉之前，它仍然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而且充滿了每個人對出人頭地的期望及想像。

然而，民工並沒有把東莞這些工業城鎮當成永久的家，地方政府視他們爲「外來人」或「外來打工的」，任何人都很容易從房子門外辨認出民工的家，每家每戶門外的牆上，都有一個小金屬牌，上面有編號及地址。住戶的私人資料也都在公安局裡留存紀錄，雖然民工的流動性很高，要準確及時更新資料幾乎不可能，但是，它至少是一個監控民工及其住所的象徵措施。民工一般最恨的是治安隊²，他們會在半夜時來突擊檢查，大力叩門、甚至破門，把民工吵醒，檢查每個人

的證件。風聲緊時，我這位沒有登記的訪客晚上要躲在陰暗的閣樓睡覺，以免治安隊查出我這位「三無人員」³。本地治安隊偶爾也會在街上巡視，檢查民工的文件，包括身分證、廠證及暫住證，沒有以上任何一種證件的，都有機會被罰。罰款金額是可議價的，一般是幾百元。有時也會被扣留，當然也要保釋金，這種差別對待，無時無刻都在提醒民工，這裡只是暫住身分及暫居地。

紅霖與妻子住在這個工業城鎮已經4年了，而采花第一次來廣東打工，已經是15年前的事。紅霖在廣東的經驗沒有她多，他是在家鄉的生意倒閉後才來打工的，他無時無刻想回到湖北山區的家，重新開始做生意。這在民工裡很普遍，紅霖像其他民工一樣（特別是男性），經常抱怨廣東的生活及工作，包括工資、住宿、伙食、氣候、地方政府、本地人等等。在我第一次訪談他們時，他們已經告訴我，計畫賺到錢後便回家，但他們也說不準要賺多少才能回家，他們根本沒有很清晰的目標。采花總是說，他們（包括她的丈夫及兩個弟弟）運氣不好，存不到錢，花錢也太多，例如，紅霖經常要看病，因為他甲狀腺有問題，而當地的醫療費又太貴，一次醫療費便是工人一天工資的兩三倍。采花兩個弟弟的工廠生涯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太多金錢收入，他們甚至有時要依賴采花及紅霖接濟，特別是當他們「出廠」時——即離職或被解雇，根據她的說法，他們都找不到「好廠」——即工資高、福利好的工廠。

采花把她的貧窮歸咎於她及他們的運氣不佳，紅霖則經常賭氣說快要回家了，因為他實在受不了老闆及工廠裡其他人（通常是來自其他省分的工人）。但我有時會對他是否真的決心回家感到懷疑，他會有點憂傷地說：「你叫我如何在家裡每個月賺到1,000元？」他的月薪其實差不多是我訪問的工人中最高的了，但錢經常還是成為他的問題，除了醫療費外，他比較愛花錢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例如，他原來的VCD放映機壞了，他會立即買一台新的；把小孩及母親帶來廣東過暑假，又幾乎花盡了積蓄。2003年夏天，他堂弟買了一台摩托車，

3 「三無人員」是指沒有工作證、暫住證或身分證的人士。

他也一天到晚考慮要買一台。他說，如果有一台摩托車，在廣東及他們家鄉會較方便。他經常騎著堂弟的摩托車，心情愉快、充滿自信、笑容滿面地載著他的弟弟、堂弟、朋友，在這個小區內到處去，這早變成了他最喜歡的閒暇活動，也成為他們幾個男性親戚的愛好，一種兄弟感情及雄性特質的表現。摩托車讓他們自由自在到處去，在陌生人中穿梭，但又與其他人保持距離，作為城市中的遊蕩者的感受及快感，也許便是紅霖愛上騎摩托車的真正原因。而他則跟我解釋，其實摩托車也方便接送采花，如果未來兒子要來這裡讀書，也比較方便。可是，他根本負擔不起兒子在這裡上學的费用。

儘管如此，2005年初，他終於花了4,000元積蓄，買了一台幾乎一模一樣的摩托車。但是，這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當地政府已好幾年沒有發牌照給外地戶口暫住居民，所以紅霖是無牌駕駛，遇上交警會被罰款。即使他回家鄉領到牌照，也是徒勞，因為，自2006年夏天起，為了打擊摩托車搶劫案，不准許外地牌照的摩托車在S鎮跑。結果紅霖只能在中井村附近騎車，鎮區或較遠的村落他也不敢去，不過，他似乎也很滿足了。

相對於女性，男性對流動有較強的追求及慾望，有時甚至會顯得不切實際，女性（特別是已婚的）則較多留在家裡或工廠。大部分年輕男性受訪者都成為我的導遊，帶我到S鎮中心遊玩，或到附近新建的工業區一帶逛逛，甚至到隔壁的鎮去，他們對S鎮的改變感受很敏銳，而且也喜歡到處去瀏覽東莞各鎮的城市地景。他們對東莞的迅速發展有很大的興趣，也覺得「好玩」，經常對比各鎮之間，及他們家鄉的狀況。工廠的打工妹雖然可能也到過許多地方打工，但日常都市經驗所覆蓋的範圍沒有這麼大，有時非常狹小，她們很少跑到離工廠及住宿處較遠的地方去。對采花來說，工廠、她的出租屋及明的水果店，已經成為她活動的中心點，例如，我曾訪問過她的兩個朋友，她們的空間經驗也差不多，在中井村工作1年多了，很少到街上逛，明的店距離她們的廠不到200公尺，但是訪問當天是她們第一次來到這個夜市。

采花對紅霖想擁有一台摩托車的想法並不高興，也不感到騎摩

托車有多好玩，對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沒有多大幫助，上班的工廠距離她家也只不過是20分鐘的步程，他們能否負擔兒子來上學，也是未知之數。她對兩人的財政狀況很了解，總是努力不讓紅霖花錢在奢侈品上，除了VCD放映機外，紅霖買了一支1,000多元的手機，她經常批評他像個小孩子，看到什麼都想要，她有時會覺得，要存到錢回家根本不可能。我也對紅霖能把金錢負擔放在一旁，老是想著摩托車及其他昂貴消費品，感到很有趣。但顯然，采花並沒有忘記他們還欠弟弟3,000元，那是3年前結婚時借的。不過，紅霖即使省下那些似乎有點奢侈的開支，他們一家子也不見得就能安穩地在廣東生活，看來奢侈地花費掉的幾千元，還不夠他兒子在廣東半年的開支。

對紅霖與采花來說，維持一個工人家庭似乎不是這麼容易，也不算是一個好的選擇。雖然珠江三角洲是個「世界工廠」，工廠的人員規模比得上任何發達國家，就有學者曾用福特主義(Fordism)來理解這個社會(馬傑偉 2003)。然而，由二十世紀初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開始，已對來自美國的福特主義式生產有深一層的思考，福特主義所指的不單是一種生產及工作類型，而是獨特的生活、思考及感覺方式(Gramsci 1971)。正如哈維(David Harvey)所說，福特(Henry Ford)當年已察覺到他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需要「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所以工人的工作需要穩定，工資需要增加，才能維持負擔大量消費(mass consumption)的家庭；後來的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更以政府力量增強有效需求(Harvey 1989a: 126-127)。事實上，自80年代以來，學界已把福特主義清楚指稱為某種社會構成的基本結構，例如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資本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Lipietz 1987)。故此，從民工的家庭生活來看，將他們視作已進入福特主義的看法似乎並不適合。大量工廠雖然提供大量就業機會，部分工廠也進行大規模生產、技術分工及科學化的管理制度，但是從本研究的田野經驗資料來看，工廠提供的待遇無法讓民工過著安穩的家庭生活，也沒有多少福利保障可言，就連把孩子接來廣東與父母一起居住亦有困難，更無法讓他們可以進行大量消費。然而，他們亦無法免於消費主義及城市生活的誘惑，特

別是我田野考察中的男性民工，他們只有獻出僅餘的積蓄來享受一丁點消費帶來的滿足，以及勉力維持一個工廠及打工以外的家及生活想像。

三、燕梅與王林：民工家庭與同鄉社群

(一) 連鎖遷移與居住

和其他民工相比，紅霖與采花的同鄉網絡並不算很強大，在中井村裡，不難發現不同地域的民工聚集在一起居住，不同省分，甚至不同縣的人會各自聚集，各自彼此分隔開來。他們操不同方言，不常往來，當中又以四川人的同鄉網絡最緊密，也許是因為他們外出打工的人口最多。距離紅霖這些湖北人不到200公尺遠，便有一大一小兩群四川人聚居在一起。

燕梅是四川綿陽人，31歲，目前在一家模型廠打工，已有2年多了，跟丈夫及10多位同鄉住在一排5間的平房，每間平房月租90元，住有1至2對夫婦，他們彼此之間都有親戚關係。最早來的陳強是5年前來到這裡，算是她的遠房舅舅。她跟丈夫鄧平住在西邊的第一間，面積較小。他們這排房子向南，門前還有空地，空地跟南面公路間有好幾片菜田，在村裡算是空氣較流通及陽光最充足的一排房子。事實上，村裡的房子擁擠在一起，一旦下起雨來，泥土、排泄物與垃圾混在一起，陣陣惡臭。民工房子通常地基較低，附近偶爾還有蛇出沒，所以燕梅他們也很自豪自己能找到這幾間房子，而我也是在中井村閒逛時，對於有這麼一片空地感到很好奇，走進來看看才遇上他們。

燕梅要比丈夫更早來打工，她第一次來廣東打工是在1992年，當時還是單身，在珠海及深圳當過打工妹。1999年回鄉結婚，生了孩子後將孩子交由丈夫的父母照顧，跟丈夫一起到廣東。丈夫之前沒有來過廣東，不過曾到過新疆當建築工人。丈夫曾要她跟他去新疆，當採棉花工人，雖然工資不低，但一年中只有冬天才有工作。她說，她在家鄉也種過棉花，不喜歡，又要打蟲又要施肥，摘棉花時手指頭也不

好受，她一想起摘棉花，又想起新疆這麼遠便不想去，但也不想跟丈夫分開，故把他帶來廣東。

隔壁的王林與他老婆也是大約2年前來的，在附近一家乳製廠工作，他老婆是陳強的表妹，王在2000年已來廣東深圳打工，收入比現時好，約有800-900元，但他坦言，因為愛花錢，所以沒有存到什麼錢，他說：「總算是見識過了」。之前他在家鄉除了種田之外，也當過赤腳醫生，他在家鄉幹這行有7年之久，收入不錯。但他與老婆生了1子1女，違反了生育計畫，計生所（指計畫生育所）要罰他1萬元，因為他在政府部門裡有些關係，於是把罰款降至5-6,000元，結果也欠下債務，兩夫妻只好南下打工還債，把子女留在家鄉。他說，如果不是欠債，在家裡當個赤腳醫生也是挺自在的，比在工廠裡打工要好。不過打工能多掙一點錢，而且工廠是計件的，他不喜歡或覺得累時便可在家裡休息，他說：「也挺自由的」。

這一排平房附近有4家工廠，乳製廠與模型廠裡絕大部分是四川人，而這排平房裡的人全在這兩家工廠打工，陳強及他老婆兩人1998年起開始租用這裡的房子，他們儼然是這個小社群的頭目，他原在潮陽當建築工，後來老婆的工廠搬到這裡來，他便跟著來了，並在附近種菜的湖南人介紹下，找到了一位本地的老太婆以每月90元租給他們。接著，他介紹親屬來到這裡打工並租住旁邊的房子，形成了一個小小的親屬及同鄉網絡。在東面馬路對面有幾排平房，是由乳製廠的廠長所蓋的出租屋，絕大部分民工也是陳強的同鄉，來自綿陽。

（二）同鄉之樂與消費

通常一天的作息是這樣的：早上7時半便要上班，中午11時半午飯及休息，下午1時又再上班至下午5時半；加班時間則不固定，有時到晚上8時半或11時半，偶爾還會通宵加班，一般星期天可休息。這兩間工廠生意不錯，只有中午及晚上才看到有人在家休憩，氣氛也挺熱鬧的。

不同的房子裡進行著不同的活動，例如東邊第一間房子面積最大，有什麼聚會也會在這裡舉行，不用上班及加班的日子，在下午經

常看到有人在屋裡看電視或打撲克。房子的右邊是臨時搭起來的灶頭，放著一個瓦斯爐及一堆鍋碗瓢盆，灶頭底下是瓦斯罐，左邊有3張床，總是有人在午睡休息，偶爾會有人從蚊帳裡睡眼惺忪地爬出來。房子外的空地，有時會有幾名女人在打毛衣給家鄉的孩子，或乘涼聊天。如果要好好休息，他們會到其他面積較小的平房裡，關起門來好好休息。每間平房一般有2張床，由於經常有熟人出入，所以即使睡覺也不用擔心會有小偷光顧。

他們中午11時半休息，下午1時再上班，中間的1個半小時，他們要不是在工廠的宿舍洗衣服，便是回來午睡、爭取時間休息，即使是不住在這裡的同鄉偶爾也會來休息一下。工廠晚上不到6時便吃晚飯，加班到11時的話，通常會肚子餓，飯堂亦不供餐了，他們就會回來煮麵或稀飯吃，有時亦會騎自行車到市場買點小吃。

跟紅霖夫婦一樣，他們說在外面住比較方便，也比較好玩。王林是個非常健談的人，滔滔不絕，他總記起有趣好玩的事，例如幾年前他在深圳西鄉工作時，晚上經常逛夜市，他最愛喝珍珠奶茶，覺得很新鮮，至今依然印象深刻。不過，他覺得現在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到處去玩了，而且s鎮中井村當然沒有深圳西鄉熱鬧好玩，但他也覺得在外頭與老婆一起住比較好，生活條件會好一點，至少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後，可以有私人空間休息，亦可以跟老婆及親人在一起。工廠飯堂伙食不好，自己便可以回來煮一點補償一下。故此，他寧願捨棄深圳較高的工資，來這裡跟老婆及同鄉一起混，還覺得要自在一點。

燕梅的處境更需要同鄉照應，丈夫鄧平來到這裡工作不到1年就脊椎發炎，在廣東花了1,000多元看病，卻絲毫沒有好轉，只好回鄉療養，至少開銷會比待在廣東要少。但如此一來便只剩下燕梅一人，平日她的表姐會過來在她家過夜、陪她聊天，也會幫忙她做飯及洗衣服。

這群四川人生活上要比紅霖他們節儉，工餘時間除了看電視外，便在自己的房子內聊天、玩樂、休息。他們在屋前空地旁種了一些瓜菜，數量不多，但晚上煮宵夜已經足夠，也省了不少錢。他們平日也

在工廠飯堂打飯，不用額外花錢，而且據王林說，夫妻及同鄉一起住，大家會不好意思花太多錢，比起單身一人可多存一點錢好寄回家給父母及子女，例如，妻子會監督著丈夫，陳強及他老婆也會監督著當保安的兒子不要亂花錢。他們5間房子只有一部VCD放映機及一台黑白電視，而且放映機播出來的畫面還會跳動，電視的光線也很昏暗，但他們也不介意地看得津津有味。

這個四川人網絡雖然不大，卻是他們的小天地，自得其樂。他們每天穿梭於工廠與平房間，繁重的工作後便是休息，也不大理會外面的世界。他們對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不平等與衝突並不太在意，反正工廠裡全都是外來打工的，只有老闆及幾個管理階層是香港人，他們說：「其實他們本地人也不怎麼樣，你不去跟他們打交道，他們也不管你。」

2004年1月某天中午12時許，我再次到訪陳強的家，陳強等人剛好中午休息回家，我被他家門外堆成小山的雞隻嚇了一跳。原來他們從附近雞場買入5、60隻剛死去的雞，價錢十分便宜，每隻才2-3元（大概因為那時是禽流感高峰期），將雞隻宰殺後取出內臟，用鹽醃好風乾。他們有點興奮地說，準備春節過年可以吃。我問：「吃得完嗎？」他笑說：「還不夠呢！你春節來便知道。」

春節期間我再到訪他們家，與2、30位同鄉吃了好幾頓臘雞火鍋，一起喝了好幾斤白酒，這些同鄉都在附近的工廠打工，或在附近的出租房居住，不少還是陳強等人介紹來工作的。他們說，雖然在工廠打工辛苦，但很享受工餘一起的生活，也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小生意，要是有任何計畫也等將來回鄉再說。對較昂貴的奢侈品也沒有太大慾望，最大的娛樂便是每個月約8號的假期，也就是工廠發工資後的一天，或其他節日假期，如中秋節及春節，他們便會狂歡一天或一個晚上，大吃大喝一頓，倦了醉了便抱頭大睡。

（三）臨時的家，臨時的社群

在這個內聚力極高的四川人社群網絡裡，民工有著家的感覺，享

受著夫妻生活、親屬的互相照應及同鄉間的友善互動，這個社群少了農村家庭裡的長幼秩序，多了同輩及青年人的活力及自主，難怪他們經常用「好玩」及「方便」來理解在工廠外的居所。嚴格上來說，這個社群都是熟人及朋友，當我跟他們混得有點熟時，王林便跟我說：「你有空便來玩，不要客氣，我們四川人都很友善，出來打工都是朋友，朋友嘛，就是互相照應，不要客氣。」他們跟紅霖及采花同樣好客，但跟紅霖夫婦相比，他們少了主人家的客套，多了熱情，他向我發出邀請，就像這裡便是他們的家鄉，當然，他們也不忘說一句：「歡迎你到綿陽，我們的家鄉」。

在這個租來的家中，他們還是很意識到此地的臨時性，陳強的老婆杜月麗說：

我家有兩個孩子，最大的已經15歲，我們來廣東5年了，打算再工作1年便回去，種莊稼或做點別的，在外面打工也打到煩了，而且小孩子沒有父母管，都不愛唸書，一天到晚到處跑，家中的公公也管不住他們。

然而過沒多久，她的大兒子不唸書跑來廣東，她有點生氣，無奈但也要接受，兒子現在跟他們兩夫妻一起住，在乳製廠當保安。

他們很清晰地了解到這裡不是他們永久的居所，王林說，他不知道將來回去要幹什麼，但他打算再打工幾年便回去了，反正他曾經在家鄉當過醫生，一天能賺10多元，一把債還掉便回去。燕梅偶爾想過把孩子帶來廣東，她問同鄉這裡的學雜費多少，同鄉說，這裡上學一個學期要1,600元，只包吃一頓及接送，這個價錢是他們2個月的工資。在家鄉學費大概一個學期才400元，生活費也比較便宜，燕梅算一算各項開支費用，便有點黯然地打消這個念頭，她說：「反正再過幾年便回去」，她表明自己不愛也不懂種田，所以才來打工，可是她很清楚，終究還是要回去的。

他們雖然在這個家很自在快樂，但卻始終覺得是臨時的。儘管如此，他們在廣東打工越久，越少回家。他們說，回家也貴，光車費便要花3、400塊，所以也是一兩年才回去一次。雖然春節假期最長，一般有2個星期以上，但通常不選這段時間回去，因為車費貴，而且

春節在廣東反而覺得好玩。但是，他們總說，最後還是要回去。他們在這裡的家一切東西都是簡陋不講究的，總跟他們自己理想的家居及歸屬感有距離，例如我偶爾在燕梅家拍照，她便顯得有點不好意思，覺得這裡沒有什麼好拍的，叫我不要拍這裡。每次去探訪王林，他多是躺著休息或聊天，見我到來除了熱情地打招呼外，總是有點不好意思，趕緊拿著抹布擦擦布滿灰塵的灶台，收拾餐具，掃掃地上的垃圾，他說：「唉，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加班，也沒有時間打掃，出來打工的人就是這樣。」

男性似乎對工業城鎮的一切比較好奇，但跟上一節的紅霖一樣，他們比較採取一種旁觀者的姿態，看到許多新奇事物，但跟這個地方保持距離感。從生活經驗上他們深感這個地方的不足，例如，他們愛跟我談這裡的菜及物價，王林總說這裡的蔥及蒜不香，及不上家鄉，菜也貴，家鄉才幾毛錢，這裡要賣1塊多，四川人愛吃辣，這裡也沒有好的辣椒，只好買罐裝的麻辣醬滿足一下口慾，這兒的鹹菜也不好吃，每次從家裡回來，總要帶上許多醃菜、皮蛋、辣椒等等。至於房子，雖然在村裡算不錯，但他們對每月花90元租房子，還是覺得不划算，陳強不只一次抱怨：

我住這裡5年了，繳給那個老太婆的租金也有6,000元！我在家鄉的房子根本不用付租金，可以省許多錢，而且這房子也有問題，例如，沒有自來水，要取水要跑到祠堂旁的井去挑水，現在連我家鄉也有自來水！

2004年底，燕梅的丈夫鄧平回鄉治病，也許是因為他第一次來廣東打工不太適應，身體變差了，回鄉差不多半年，她看著床前貼著的孩子照片，非常想念丈夫與兒子，但為了多掙點錢，還是待在這裡打工，她盼著丈夫早日從家鄉回來，但她也不知道丈夫還願不願意回來打工，她總覺得，如果兩個人一起在這裡打工，可以快一點掙點錢，回去做點「什麼的」。每次問她，她也說不清，反正是不想幹農活。她其實很享受打工生涯，特別是跟同輩親人及同鄉一起生活的愉快日子，可是正如她說：「打工也打到煩了」，而且，她也想著家鄉的丈夫及兒子。

親屬與同鄉的關係網絡構成了他們新的家，新的社區。工廠生涯

所締造的不是完整而穩定的工人階級家庭，只是簡陋的家及臨時的同鄉網絡，如果沒有較強的同鄉網絡，又沒有伴侶，不少人會回到工廠宿舍居住，甚至回到家鄉。但有了這些網絡，他們可以進一步壓縮開銷，忍受工廠低廉的工資，在這樣荒蕪與陌生的工業城鎮裡，尋找到小家庭的樂趣，同鄉同輩人互相扶持的快樂。正是這樣的社群協助了勞動力再生產，讓這些已成年已婚的民工仍留在這裡工作。

（四）諸多束縛的都市經驗

以上這兩群民工家庭，在珠江三角洲城鎮中，經驗著社會經濟不平等並與本地人空間分隔，他們慢慢建構出以小家庭及親屬為中心的家庭領域(home territory)，即使是臨時而不穩定，也充滿著慾望、情緒與想像。他們手上只有有限的資源，設法維持一個像家的地方，他們既與同鄉一起生活，也享受片刻夫妻私人空間，並嘗試創造出一種有別於農村生活的新生活。他們從自己的領域裡體驗自己可以負擔的現代生活，而這個領域又與本地廣東人是完全分隔開來的。

過去在都市研究中，理解族群社區是最重要的工作(Gans 1962; Lewis 1959; Whyte 1955)，芝加哥學派運用都市生態的均衡模型，去描述社會競爭過程的空間動態(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1967)，他們以市場經濟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作為前提，備受馬克思主義及其他學派的批判(Castells 1977; Harvey 1989b; Pahl 1983)。在這個研究中，民工打造家居及社區網絡的實踐及經驗，完全是坐落在空間區隔及社會分化之中，而這些過程是工業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是一種工人階級打造的結果，這完全確認了哈維對生態學派的批判(Harvey 1989b: 123)。但是，我們也不應單單視他們的「家」為滿足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單元，而忽略了當中複雜的制度「嵌入性」(embeddedness)。換言之，不應把空間分隔及聚集視為資本積累延伸的力量。民工家庭與本地人的分隔，其實是戶籍制度在地方空間上的再生產，戶籍的區隔壓縮在一個更小的範圍，並以階級身分為界線。

從個體及群體能動性來看，我們也看到他們的家居與階級處境的關係。廣東的資本主義生產以長工時、低薪、家父長式管理等特點

廣為人知，按馬克思的說法，是榨取絕對剩餘價值的系統(Lee 1998; Pun 1999)，它把工人的生活困在車間、宿舍及工廠飯堂，大部分工人很少有機會作為城市居民享受閒暇，他們的現代及都市經驗被高度限制，甚至被階級支配壓抑，無論是國家政權及資本主義工廠生產制度，都不允許他們享受充分的城市居民權，也不提供他們制度上的支援及資源，好讓他們在城市中定居及成家立室。因此，在工廠之外打造家居，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性(necessity)之下的功能衍生，也非農民家庭的延伸，而是民工充滿意義的突破行動。他們一方面在工廠制度支配之外重新奪取一些自己的空間，維繫夫妻親密關係、享受同鄉及家庭生活、追求社會身分的上升，同時經驗著都市現代性；另一方面，雖然他們免不了成為工廠勞工，亦無法擺脫消費品的誘惑，但他們與工業城鎮始終保持著一種疏離(alienated)的感覺，不管是驚嘆繁華的物質生活，還是感到社會制度對他們的排斥。不過，在資源緊缺下，他們不盡然是完全反應式地適應工廠的規訓，或是虛幻地追尋消費主義的都市生活，或所謂的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zation)（馬傑偉 2005：25），而是創造出自己的小群體、生活空間及價值，一種獨特的都市文化與意識。

對他們來說，因為家居領域不斷受到工廠制度及國家權力的衝擊及干擾，必須在工廠繁重的生產時間裡擠壓出一點家居時間，但他們仍然在家庭領域及同鄉網絡中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們在臨時的家，捕捉一點家庭感覺，享受夫妻親密關係，把小孩帶進城鄉流動之中。不過，他們的階級身分低下，使他們無法享受穩定的家庭生活，地域差異、差距與戶口制度，亦使他們無法成為本地人，再加上家庭成員分隔兩地，在內陸省分與沿海地區之間斷斷續續地流動，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是在「本地化的地方」(localized place)經驗著家庭生活，而是在不穩定、跨地域及流動的空間及網絡中建立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背負著農村的家，居於臨時的家，想像著未來的家。

四、打造家居，想像社會流動

以上我們從幾位民工的經驗，看出他們的家居及社群網絡如何既滿足了勞動力再生產，又充滿了逃逸工廠生活的動力。若我們轉向那些嘗試進一步擺脫當下工業生涯的外來農民，更看得出他們在工廠支配下的家居及社群經驗，是朝向一個未知的將來。對這些農民來說，那又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未來。

（一）民工家庭與小店

村子的西邊有4、5排房子，每排有10多間房子，通常是兩層高，中井村村民的老房子多在這裡，可是現在只有一兩戶老人家還住在那裡，他們很少外出，大部分房子現在都租給外地人。這裡以四川人居多，形成了一個小四川的社區，走進去聽到的盡是四川話，作為湖北人的采花便會說，那是「四川人的地方」，然後她會加上一句：「都是四川廣安來的，他們四川人的孩子真多。」平日，采花只會路過此地，很能感受到這裡自成一角，特別是經過一個水井，會看到4、5個女人在洗衣或洗菜，也有閒著的男人在乘涼，采花偶爾也會走進巷子，到四川人在一樓經營的小型雜貨店買點日用品。

這個四川人小社區很熱鬧，約有100多人，每戶通常是男戶主、妻子與小孩，這在我的田野考察裡算是最具規模的社區了，但是這樣的社區卻不是工廠工人社區，只要看一下男戶主黝黑的皮膚，便知道他們大都是建築工人。他們的職業及行業特性也讓這群四川人更凝聚，又與本地人分隔開來。據一名來自四川的建築工人說，包工頭招工通常會找一群來源相近的人，同鄉網絡也使得他們容易找到包工頭及工作，住在一起互通消息也容易。但是包工頭則相反，一般是本地人，因為建房的多為本地人，而且不少建築工人怕外地來的包工頭會騙錢，工程完成後捲款逃跑。若是本地人，一般不敢賴帳，因為家人及親屬都在本地，有什麼事，工人也能找上門來。故此，這個小社區的男性職業非常相近，與幾名本地人維持著穩定的關係。

建築工人中以男性為主，亦是男性工人較常從事的職業，建築工人一般並不羨慕到工廠打工，有時甚至嗤之以鼻，覺得比不上在建築工地工作來得好。四川人譚明，30歲左右，他說，當建築工人雖然

辛苦，但日薪工資較高，一天可以有20至50元不等，不同工種收入不同，例如做水泥模板及搭棚子的較高，雜工較低，但不管如何，都較工廠工資高。而且工廠一般也只聘用女性，沒有技術的男性難以進入工廠，建築工對男性來說也容易入行。他們不約而同地說，當建築工人較自由，累了不想幹時，休息個半天一天也不是大問題，不像工廠般要守紀律。

白天建築工人出外上班，家裡只有妻子與小孩，他們會打開家門在巷弄外走動或聊天。走進巷弄會看到許多稚齡小孩，不少還是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最大的不超過8、9歲。據他們說，不少是所謂「超生兒童」，父母在家鄉已有一個孩子，但想多生幾個，爲了逃避計畫生育，所以便在廣東生小孩。據他們說，這個小社區裡還有幾個接生婆，不用到醫院待產可省點錢，用中國大陸媒體的說法，就是所謂「超生游擊隊」的小社區。

我第一次進去這個小社區，這些女人也覺得我很奇怪。雖然我闖進他們的領域，但他們並沒有對我有太大的敵意，除了偶爾投以奇怪眼光外，他們還是自在地聊天，甚至若無其事地哺乳，好像我這個外人並不存在似的。女人與小孩通常會聚集在某幾戶人家家裡，打毛衣、看電視、聊天，小孩子到處跑，剛出生的嬰兒則在地板上爬行或滾動。

在這排房子西邊靠馬路的地方有一家小雜貨店，算是社區裡最具規模的，四川人都愛擠到這裡來，一方面是因爲這裡有一台大電視，訊號接收也較好，畫面清晰。而且，小店經營的項目多，既賣糧油雜貨、菸酒汽水及小吃，還兼營修理腳踏車，亦有麻將出租，每天不論早晚，總有人在打牌。一看老闆羅剛膚色，便知道他是建築工人，他今年42歲，也是四川廣安來的，出來打工已有20多年，他在家中是長子，14、15歲便出來打工，負起養家的責任。他走遍大江南北，北京、山東、福建、海南都去過，他很愛談以前打工的經歷，例如，他很自豪地說，當年去海南時還是偷渡過去，因爲那時的海南既尚未建省，又是軍事重地。他還記得，偷偷坐船過海時搖得很厲害。他在廣東已有8年，算是停留最久的地方，他的3個弟弟也來了廣東，有一個

弟弟更住在他隔壁。

他說，在這裡掙錢辛苦，每天晚上開店到午夜12點之後，有時還到凌晨2點，第二天早上5、6點便起床，7點便要到工地上班，只睡幾個小時。但也沒有辦法，不開店賺錢便少了，反正他女人在家只是照顧小女兒。他對當建築工人尚算滿意，至少並不覺得在工廠打工是較好的選擇。去年他弟弟還在鄰鎮工廠打工時，與工廠裡其他工人起了爭執被公安抓走，被控打架及竊盜，他還要拿錢去把弟弟贖回來，他有點生氣地說：

老早叫他不要在工廠幹，他這個人又單純，他其實不會偷人家東西的，工廠裡人又多，誰是好人壞人你也不知道。這次我把他找出來，跟我一起做建築工好了，有個照應，反正他跟老婆一家也住在我對面的房子。

我訪問羅剛時，他的小女兒才1歲半，在這個小社區出生，連醫院也沒有去，由他們的四川接生婆接生。按計畫生育規定，他的小女兒也是「超生」的，不過反正不在家鄉出生，政府也管不來，將來讀書時才需要辦手續及繳罰款。他另外有一位在家鄉出生的15歲孩子，今年讀初中，去年曾來這裡讀書，學費一個學期便要1,500多元。但是羅老闆說，總不放心讓他在這裡到處跑，兒子也覺得在這裡不好玩，整天被父母困在家裡，只能在家吃零食看電視，回去的話他自由多了，沒有人管他，在家鄉他到處跑家人也放心。羅剛笑說：「前陣子打電話問他要不要來，他也說不要，孩子始終喜歡家鄉，這個孩子已懂得很多事了，還叫我寄錢回家。」

他雖然來了8年，但這個家還是很簡陋，不到20平方公尺，靠近門口的窗戶旁放了電冰箱，他把窗戶開大了，成爲一個對外的櫃台，旁邊放了幾個擺放香煙及雜物的架子，進門右邊是燒菜做飯的灶頭，灶頭後堆滿了修理腳踏車的零件及工具，房子中間通常放了一張麻將桌，所以根本沒有地方修腳踏車，只能在門外的馬路邊弄。更多的雜物則堆在房子的閣樓，這一家3口唯一的私人空間，就是進門左上角用活動圍板間隔出的小房間，用布簾隔開，只夠放一張雙人床。

我不敢肯定，這樣的家會否是他的長遠之計。他的家就是他的

店，亦讓他的生活無時無刻也在掙錢，錢在手裡可以團團轉，不管上班還是回到家裡。他說，將來小女兒長大了，可能又要有新的安排。店裡一個月的收入可以有2、3,000元，建築工人有工作時可以有1,000元左右，足夠他與妻子安身在廣東。他除了要養活廣東以及家鄉兩邊的家外，他現在想著的都是未來，他說，現在什麼都要錢，花費很大，他不停跟我計算兩個孩子都上大學的話，家裡一年不知要花多少錢，又擔心每個月賺來的錢不夠他們花，他說：「現在什麼都貴，掙錢不容易」，他指著放在小店角落的那台電視機說，那個也要1,000多元啊。

（二）穩定的民工家庭

羅剛的店及家雖然簡陋，但基於他職業的性質及家庭狀況，算是一個頗適合的安排。雖然工作辛苦，但總算能應付廣東這個家庭及家鄉的需要，亦能維持了自主，甚至有少許階級流動的味道，至少名義上他是「老闆」，而且又能擺脫工廠生涯的束縛。在我的受訪者中，真正比較穩定由工廠「打工仔/女」慢慢衍生出來的家庭，只有羅志文與妻子余美，他們在大街上經營著一家鞋店，他們倆是采花的同鄉，采花常很羨慕他們，她會感嘆，自己比別人還要早來廣東打工，人家已是小老闆，自己還在工廠打滾，至於剛開店的明則有點嫉妒，他常說：「這個羅老闆賺很多錢」。

羅志文的店有20多平方公尺，還有閣樓作為小倉庫，月租要600元，租金比起羅剛的小雜貨店100元要貴得多，但該店面對著村裡最繁忙的街道，晚上附近的民工出來逛街，非常熱鬧，生意不錯。店的布置也很簡單，四面牆是鞋架，賣的主要是男性皮鞋，羅志文接受人家訂製皮鞋，工具及縫紉機放在正中央，門口左邊亦放了一些工具。店右邊還有不到幾平方公尺的小房間，住了他們兩夫妻與6歲的女兒，他們也經營這家鞋店10年了，這個家也在此落腳10年了。

長遠來說，他們把廣東當成第二個家鄉，妻子余美說：

現在我們5、6年才回鄉一次，平日做生意，不想回鄉，春節人多車費又貴，又不想回鄉。現在跟家裡關係也不像從前，以前出來打工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幫補家用，現在偶

爾才有需要寄錢回家，家裡只有幾個老人，不是那麼需要錢，而且我們在這裡也有一個家，一個店。我們去年回家，帶了幾千元回家花，買東西多了，結果回來時不夠路費，還問我母親借了錢買車票才回來，跟以前不一樣了，真有點不好意思。

經營鞋店以前，羅志文與余美都是鞋廠工人，91年從湖北山區來到廣東，在哥哥的介紹下，進了一家港資鞋廠打工，由全無技術的車間工人，晉升到會造皮鞋樣版的師傅。他能學到手藝，也跟他兩個哥哥亦在廠裡製鞋有關。96年時，他剛結婚，兩個哥哥又先後離開工廠，到外頭開鞋店。他說，那時考慮到要留在大廠當高級的樣版師傅並不簡單，要講技術，也要懂得跟上潮流，不然款式舊便沒有人跟你下訂單。當時手頭上有一筆1萬多元的本錢，就覺得自己出來開鞋店反而較容易多賺一點錢。他坦言，每個出來打工的人也想當「老闆」，白花花的錢來來去去，總比待在工廠要強，他們對於在工廠內晉升並不抱很大期望。

96年開業時生意很好，皮鞋是外地來打工的男人的日常必需品，幾乎每個人都穿一雙，不管是上班還是逛街，到工廠或是辦公大樓，走在水泥路還是泥濘路，也都穿西式皮鞋，所以需求很大，而那時開店的不少是本地人。據羅志文說，本地人鞋店價錢降不下去，本地人也不好意思降價，以免弄得與同鄉的關係不好。本地人不願跟外地人鬥便宜，但外地人開鞋店沒有這個顧慮，可以價格取勝，而且跟不少外地民工顧客是同鄉，能爭取不少客人，利潤也不錯。

他說，現在開店不像從前，街上已經沒有本地人開的鞋店了，外地人的店也多，單單這條街便有5、6家鞋店，來自溫州的較多，競爭激烈。以前一年可賺3-4萬，現在一年才賺1萬元，他說：「你看，扣除日常開銷及成本，兩夫妻賺1萬元，每人5千塊，不算多吧！不如到工廠打工。」不過現在孩子小，兩夫妻在店裡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她會比較好。羅志文似乎對做小生意認識深了，期望也沒有以前高，他說，等孩子長大一點，上學了，便會試一試回廠裡打工，做樣版師傅，當然店還是照樣經營，不過，現在製鞋收入占總收入較高，只有妻子一人便做不了多少鞋，僅靠賣鞋，店的收入自然會減少。

雖然現在S鎮開店賺大錢的機會已過，做家庭式小買賣競爭也很大，絕不容易，但羅志文一家的經濟條件還算是不錯的，生活也非常穩定。即使像羅剛那樣，當建築工兼開小店，也算是個老闆，工作辛苦，但收入也比在工廠來得強與自由。他們這樣的小家庭，得到不少人羨慕，他們擁有「老闆」與「老闆娘」的身分，成為模仿對象，一些民工夫妻或情侶出廠後自組家庭式小生意，紅霖的弟弟明與他的女朋友惠珍便是一個例子了，以下將以他們的個案作為本節的總結。

（三）逃出工廠，重拾金錢

2003年6月，明與他的女朋友惠珍開了一家水果店，開店的構想是惠珍提出來的，她父母在東莞C鎮也開了一間小店賣雜貨。惠珍在一家工廠認識明的，她在那兒做文員，明則為車間工人。明像其他男工一樣，覺得工廠生涯既沉悶又沒有前途，他在2月離開了廣東回到武漢，他是湖北人，覺得在湖北這個大城市會比較有前途，而且又靠近家鄉，可是他跟惠珍的愛情關係，把他又從湖北拉回來廣東。惠珍在6月離廠開始她的小生意，她打電話給明，希望他成為她合夥人，明答應了，又回來S鎮。

明對開水果店其實並沒有太大信心，儘管如此，他還是無法抗拒女朋友的邀請，因為他想跟她建立長久關係。他們把兩人的親密關係建立在生意合夥關係上，「合夥」即意味著同居，並慢慢發展到最後兩人結婚成為夫妻。同居在民工中頗為普遍，而做生意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名正言順住在一起，父母大概也會同意。

當惠珍有了做生意的念頭，「水果店」的構想隨即湧現，因為她有許多同鄉都是幹這一行的，這裡的同鄉定義較廣，即指來自江西省的。S鎮的水果店的確不少標榜是江西人開的，她的表妹以前也開過一家水果店，但倒閉了。她向表妹借來一個舊冰箱及一個燈箱廣告，這可省下不少錢，燈箱上還印有「江西」二字。她分析過市場後，對生意的前景頗為樂觀，她並不打算在附近晚上最繁忙的大街上開店，因為那裡的租金較貴，要600至1,000元，而轉讓費高達6,000元。而且，大街上已有3家水果店及1家超級市場，她認為，在一條新建好

的街道上開設水果店，是比較好的選擇，而且又跟紅霖家很靠近。街道兩旁有不少工廠及宿舍，但只開設了不到10間店，又完全沒有水果店，唯一的競爭者只有店對面、擺在工廠門外的攤販。她相信，越來越多的工廠將會在這條街道上開設，亦會有更多工人，若街道熱鬧起來，水果店的生意便會好起來。

惠珍花了1個月時間，在明回到東莞前，便找到這個月租600元的店舖，惠珍與明各自投資了8,000元及3,000元作為本錢，這個金額相當多，大概是一個工人1年至1年半的工資，如果沒有明的哥哥紅霖及其他親戚幫忙裝潢，要花的錢會更多。惠珍在S鎮幾乎沒有什麼親人，紅霖及他的家庭網絡對她肯定很重要，她稱呼紅霖為「大哥」，態度親切，既是尊稱，也暗示要拉近她與紅霖的親屬網絡的距離。

他們的店是一幢兩層高的房子，兩層加起來有150平方公尺，坐落在一排商舖——有雜貨店、餐廳及照相館——之中，另一邊則是工廠、書攤、水果攤及其他攤販。一樓是店面，擺放了水果、糖果、餅乾及其他小吃，二樓是居所，分成兩間房間，惠珍與明住在其中一間，另一間提供惠珍的父母及其他賓客居住。他們把所有錢、時間、精力都花在店面，根本沒有花任何心思在居住空間，店開了4個月，都還沒有買床，他們還是睡在一塊很大的木板上，當我探訪他們的「家」，他們感到很尷尬，店舖樓上的兩個房間，根本沒有半點家具。

工廠工人經常投訴工作條件及薪水差，他們常常把做小生意視為理想行業，比起為「別人」打工，或聽從別人指揮要好得多。事實上，做這種小生意的成本也不算太高，很容易進入本地零售市場，除了租金及生意本錢外，每月只需繳交100多元的管理費給村委會，也不用向鎮或市工商部門登記，與擺攤的唯一分別只是有沒有租店舖而已。故此，這些零售市場的小經營者極具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性質，即市場門檻低，規模小，市場高度競爭(McGee 1973; Hart 1971; Mazumdar 1976)。

做生意被高度浪漫化為「比較自由」、「自己想怎樣便怎樣」、

「比較好」等等，當別人稱惠珍與明為「老闆」時，他們雖有點靦腆，但也感到很開心與滿意。不管是本地、香港或台灣來的，「老闆」這個詞也經常用來指稱那些開工廠的雇主，所以「老闆」總是意味著較高階級及向上的社會流動，大部分民工其實並沒有太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自己會成為南中國的新貴，但「老闆」的身分對民工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相反地，「打工」並沒有給予他們安全感、穩定及自尊，它只是「沒有前途」的代名詞，特別對男性更是如此。明便經常爲了打工的種種發牢騷，他從來沒有視廣東爲家，這一點也不奇怪，我從來沒有遇過任何一位打工者視「打工」爲長遠的打算，不管是工作了多年的工人，還是剛入行的。

我的受訪者都喜歡比較在工廠工作與做小生意的區別。明與惠珍的店剛開張不久，曾與明及惠珍一起工作的工人也來到賀，偶爾也坐在店裡店外湊熱鬧，他們聊起做小生意，總是神情愉快。其中一位工人文卓，他以前也在家鄉做過點小生意，他看著兩人的店有點感嘆地說：「當我在家鄉做小生意時，鈔票每天從我的手進進出出，我感到特別高興，工廠工人每天辛苦工作，但卻完全看不到錢，我們每個月只領到一次薪水。」

他的說法，有點像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他雖然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剝削關係，卻意識到工人無法過問價值實現與資本積累的過程，工人處於異化的境地。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看，他這種意識也是「金錢拜物教」(fetishism)。文卓認爲，工廠的生涯讓人脫離了金錢的流動，只獲得每月一次發放微薄的工資。他對金錢在身邊流動的著迷，也許亦呼應我在田野中一件很瑣碎的事，有好幾位跟我較熟的民工，總要求我跟他們兌換港幣，不是爲了買什麼，而是爲了「好玩」，擁有不同幣值的港幣，好像多接近了一點金錢的力量，其中一位民工更要求我帶點美金給他看看。

從他們的都市經驗中，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帶來的薪資勞動(wage labor)，的確造成對生產者的異化，但不是像馬克思主義所說，資本家把工人剝離開生產資料及生產過程，也不是剝離開他的勞動產品與勞動過程，而是剝離開金錢流通過程。民工不單把小生意視作脫離工

廠制度的重要途徑，同時，亦看成是讓人更靠近及掌握金錢流通的過程，從而想像成是社會流動的途徑，渴望著自由的生活、自主的身分及可敬的地位。

（四）不只關於金錢

然而，惠珍與明的經驗卻說明了，這種想當小老闆的金錢拜物教是指導生活的意識形態，卻和現實還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打理一家小店，跟打工可說是同樣辛苦，也嘗不到多少自由。工人對工廠雇主及管理階層支配的情況很清楚，但他們不少人並沒有想到工廠外的世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看不見的力量所支配。

每天早晨，惠珍與明各自把對方從床上被窩中拉出來，並到一樓把大門打開。爲了多賺點錢，他們在6時半就要開店，因爲工人們會在7時半上班前來買一些餅乾之類的東西作早點，但惠珍及明往往要8時至9時才起床，因爲前一晚他們開店至凌晨。明甚至想過，從采花的堂弟處拿來一部三輪車，早上6時左右把水果拉到市場去賣。但這個想法從來沒有實現過，他們每天都累得要命，根本不大可能在8時前起床，因爲前一晚要凌晨2時才關門，大量工人深夜之後仍然會來買東西，有時是剛加班結束出來逛逛，更有一些工人趁著難得翌日是假期，所以在街上玩得晚一點，爲了生意，惠珍與明無可奈何，只有延長營業時間，多做點生意。

幾個月後，惠珍用「困在籠子裡」來形容這生意。白天工人都工廠上班，很少人來光顧，但他們不想失去任何一位顧客，特別是他們想盡快收回成本，所以仍然開店。偶爾明與惠珍累得在出納桌上睡著，但事實上打瞌睡的時間也不太多，因爲他們每天要花大量時間與精力去處理數之不盡的瑣碎工作——清理、記帳、定價、訂貨、做飯、跟顧客講價等等。明每隔幾天便到東莞市的市場買貨，一去便是半日，只剩下惠珍一人看店，便更忙不過來。

傍晚是生意的高峰時間，他們都忙著招待客人，同時又要匆忙準備晚飯，有時他們會乾脆吃幾塊餅乾充飢了事。紅霖、采花及其他親戚下班後，會來幫忙一下，否則他們根本應付不來。

無論惠珍與明多麼地累，他們堅持至半夜之後，等待人群漸漸稀少，才能睡覺。然而，辛勞並沒有令他們得到回報，他們每個月幾乎都入不敷出。生意差，明有時責怪對面湖南人的水果攤，但他也有時把問題歸咎為地點不好，以及顧客消費力不足。根據他的估計，這條街道大約只有1,500個工人，他們工資很低，而且很節儉，每花一毛錢都仔細計算過。根據我在店裡的觀察，平均每名工人每一次購物只花3塊錢左右。明說：「工人每月只賺500-700元，這裡有超過10家店，我們能從工人身上賺到多少錢呢？」他認為，從「外來人」、「打工的」身上賺不了錢，本地人——即廣東人——有較高的消費能力，但他們逐漸搬出區外，明很清楚知道，大部分人傾向到大街去購物，而不是留在這條靠近工廠區的小街，這亦是為什麼他想過要大清早去附近的市場賣水果，因為大部分本地人也會到菜市場買東西。

明與惠珍的經驗，充分說明做小生意的民工的困境。明與惠珍在經濟上有多少改善，實在很難說，他倆離開工廠後，一頭栽進資本主義支配制度的另一部分——以民工為對象的零售市場。他們長時間工作，投入自己僅有的資金，自我剝奪任何閒暇。正如上一節羅剛的分析，5年前開始，大部分本地人陸續離開大街，將店鋪頂讓給外地人，因為本地人很難跟民工競爭。即使利潤下降，店與店之間進行割喉式競爭時，民工仍然願意幹，羅剛明確地指出，現在經營小生意賺不了錢，它不過是變成了維生工具。換言之，消費者也好，經營者也好，皆是階級地位差不多的人，他們其實也是民工，因此他們被困在自己的藩籬經濟(enclave economy)中，老闆與工人的差別，主要在於「稱謂」，地位其實相差不遠。

明與惠珍身邊的人開始懷疑他們是否能賺到錢，過了好幾個月，他們一直無法把本錢賺回來，這對紅霖、采花及惠珍的父母帶來很大的困擾，亦影響他們的關係。水果店開張兩個月左右，惠珍父母便提議明到工廠打工賺一份薪水，而惠珍則自己照顧水果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紅霖與采花很憤怒，覺得是一種侮辱，他們覺得惠珍的父母把明「看扁」，認為他沒有能力做生意，紅霖與采花的反應清楚顯示出他們對身分地位差別相當敏感，尤其是工廠工人與店鋪老闆之間的

差別。然而，他們並不是神經敏感，據我所知，惠珍的母親經常對明的貧窮家鄉有許多怨言，她害怕女兒嫁到窮人家後會吃苦。采花進一步指出，如果明離開水果店讓惠珍打理，他們的關係有可能慢慢便泡湯了，明投進去的錢會化爲烏有。在她眼裡，惠珍父母的建議似乎是一個騙局，她開始懷疑惠珍及惠珍父母的誠信，他們說著不一樣的方言，在采花眼中，仍然是「外人」，在她的熟人網絡之外。

幸好，幾個月後，惠珍慢慢獲取采花與紅霖的信任，但他們財政上的困難依然未解除。明曾經是一位室內裝修工人，他相信自己在武漢與承包商有交情，應該可以賺到錢，所以他建議一起盡快結束生意，然後在武漢定居，將來再籌畫開一家店。但沒有人贊同他的看法，惠珍的父母（也許包括惠珍在內）擔憂女兒在陌生地方的生活難以適應，采花及其他親屬對在武漢開店也感到悲觀。

惠珍對明的建議感到猶豫，她不想這麼容易便放棄，後來他們同意先將店轉讓給別人，開價人民幣8,000-10,000元，想先拿回本錢，再到別的地方開店。他們問我意見，我老實告訴他們，這個價錢實在太高，因爲據我的觀察，即使店開在大街，頂讓費也不過是6,000元。除了惠珍與明，我所有受訪者也同意我的看法，他們把「頂讓」的廣告貼在店外許久都乏人問津，他們繼續經營，期望奇蹟出現。采花的弟弟仲華的評語，很能總結他們的處境：「我相信他會繼續做下去，他不太可能結束，因爲這生意不只關於錢，也跟他與惠珍的感情有關，亦是這個原因，店對他們倆值這麼多錢。」

過了夏季，民工對水果的需求下降，生意更差，明接受惠珍母親的建議，到鎮附近當裝修工，一星期只回家一次，店由惠珍打理，所以她更依賴紅霖、采花及他們的兄弟及表親，他們在晚上生意尖峰時間都來幫忙，她強烈感受到，這樣的情形不能長久下去，但他們又無法拋棄這個新的家及生意。很無奈地，到了十一月中，他們還是關門大吉。

他們欠了同鄉親戚7,000多元，生意又沒有前景，要關門似乎是很自然的。但事實上，賠本只是倒閉的其中一個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惠

珍懷孕了，這對他們的關係及計畫帶來很大的影響，惠珍獨自無法打理店鋪，而孩子出生後，他們的財政狀況只會更差，經營水果店會更困難。他們還沒有結婚，似乎沒有預期這麼快便有孩子，這次意外懷孕使他們需要重新計畫，以維持彼此的關係與生計。

惠珍的母親建議他們搬到C鎮，他們負責照顧惠珍與孩子，而明可以幫忙打理她父母在廣東的小生意。惠珍的父母在廣東賺了點錢，打算在家鄉開店，長遠來說，他們想把C鎮的生意交給惠珍與明，可是，C鎮的小生意也不好做。惠珍把孩生下來後，他們把孩子交給惠珍的父母照顧，明便回到之前的工廠打工，而惠珍跟她妹妹到深圳打工去了，他們「家」的大計要落空了，惠珍總結說：「好像作了一場夢，又回到起點。」這是一個新的起點，也是一個舊的起點。

五、打造家居·經營小生意·打造都市文化

西方社會理論從西歐工業資本主義與隨之而來的都市生活中，界定及描繪現代性，若以馬克思與齊美爾作為代表人物，則勞動過程的異化與金錢經濟的異化是為兩大軸線，由此而為全世界定出一個具普遍意義的現代性，並反過來把西方都市建構成為現代都市的模範，建立一套城市社會及文化演進路徑，以及城市之間的層級。但正如羅賓森(Jennifer Robinson)所說，現代性不應視為一特定的社會構成，而應是一種關於「當下」的歷史意識形式：視「當下」與之前截然不同。不同時刻發生的現代性，總把某些社會構成與進步觀念連繫起來，而與此同時，亦把一些被視為「過去」或傳統的觀念重新打造出來(Robinson 2006: 35-40)。因此，都市現代性及文化，需要進行後殖民主義的批判認識。

民工的家及家庭是一種新的社會空間與社會制度，讓我們看到其現代性。首先，他們跨越了原來的城鄉戶籍行政劃分，產生了一種官方分類以外的空間及範疇。從西方經典理論角度看，這種家庭固然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關係的社會結果，而且亦是金錢邏輯及工具理性

下的產物，可是我們需要看到珠江三角洲的特殊性，這裡的工業化所造就的，主要是工廠－宿舍體制下的個體勞工，即俗稱的「打工仔／妹」，而非工人階級家庭。低廉的工資及極高的勞動強度，壓榨初生勞動階級家庭的存活空間。加上仍然承襲下來的戶籍制度，不管是紅霖與采花，還是明與惠珍，他們的家及家庭，始終處於不穩定及臨時的狀態，既與英國工人階級的構成過程不同，更與後來福特主義所描述的依賴持續增加及穩定收入的勞動階級家庭，相去甚遠。

同時，金錢經濟與社會分工所帶來的個體異化與都市厭棄，似乎不是農民工帶來最主要的都市文化特徵。正如不少第三世界城市研究指出，勞工家庭所處的都市環境，有著非常強的傳統網絡，農村的社會關係在城市中得以部分地延續與再生，珠江三角洲的民工不是齊美爾寂靜主義式的個體（劉小楓 2001：xix），他們同鄉的親密程度有時比家鄉農村社會更高更深，其人口構成也以青壯年群體為主，父權及宗族性質減弱。他們也許對都市生活亦有一定的厭棄，但卻並不是回到個體的孤立與漠然，而是走回同鄉間相濡以沫的群體，他們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找到快樂與安全感，這些社群網絡又使他們與本地社會分隔開來。

不少研究指出，戶籍身分制度的分隔影響著資源的分配，造成了階級剝削及不平等（吳介民 2000）。然而，從田野的觀察所得，戶籍身分制度並非是造成民工與本地人分隔的唯一因素，民工所經歷的都市過程，特別是他們打造自己的家及家庭，亦反過來強化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社會分隔，甚至是來自於其他省分工人之間的分隔，以至於對本地廣東人採取漠視的態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工廠－宿舍制度打造個體化的「打工者」，但是，不少民工期望脫離工廠，渴望在銷售市場上當小規模個體戶，這個現象讓我們看到，不少民工對金錢經濟邏輯有著獨特的適應與應對方式，工廠的薪資勞動讓他們獲得一定的現金收入，但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及力量，只享有微薄的工資，還得忍受工廠沈重的勞動量與人身支配。金錢帶來表面的自主與自由並未使他們自在滿足，反而有著沈重的異化感覺。因此，他們在日常論述中，把自主與自由

投注在「老闆」的身分，這個詞成爲出人頭地的代名詞。他們追求獲取小老闆身分的慾望，源起於他們對薪資勞動的異化形式感到挫折，進而渴望重新進入及掌握金錢經濟的流動。故此，若真的有所謂都市厭棄，他們真正的厭棄對象，是工廠制度與薪資勞動，它帶來的是表面自由與實質的羈絆。他們應對的方式主要並非個體心理的封閉，而是主動籌謀逃逸，想像向上的階級流動。從這個角度看，「小商戶化」既是擺脫異化舉動，亦是一種特別的「金錢拜物主義」，成爲一種特有的都市文化。

然而，民工晉身成爲「小老闆」的努力與慾望，固然受著資本主義金錢經濟的誘惑——金錢作爲一種象徵及獲取自由的工具，同時，亦受著消費主義市場的興起所帶動。但是，他們沒有完全逃逸出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小老闆」越來越受到各種局限，甚至再次被追捕。工業小城鎮的消費市場，充斥著大量由民工轉型成的小商戶，本地廣東人慢慢退出，形成一個或多或少有一定邊界的藩籬經濟。但民工的消費能力不足，加上他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小老闆」不一定是擺脫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有效方法，小經營者有時不過換了支配形式，進行自我剝削，甚至最後亦要回到工廠繼續勞動生涯。明與惠珍這對青年男女成家的故事，最能點出擺脫工廠當小老闆，但卻又再進入另一種支配，最後更得回到工廠。

因此，要從民工角度談市場或市場社會，我們要注意到兩個社會邏輯不一樣的「市場」，第一爲工業勞動市場，第二爲地方零售市場。兩者雖然皆嵌入社會組織，例如民工親屬與同鄉組織，但卻有不同制度限制，亦有不同的實踐邏輯。前者是工人被隔離開工業城鎮社會，困於眾多的工廠—宿舍世界，他們的「打工者」個體身分，既是一個獨立個體，亦是被限制在臨時空間的個體，受著家父長式的管治支配，剝離了工人的社會生產及再生產關係。在後者中，民工可以說是嘗試穿越結構限制，努力擺脫工廠支配，打造自己的家居及社群，投入非正規經濟活動主導的市場，重組各種日常生活的安排及社群關係，發揮作爲弱者在日常實踐中的「應對戰術」(tactics)(de Certeau 1984: xix)，嘗試獲取到較大的自主性。然而，這種市場亦無法完全脫

離工廠生產制度的約束，低工資勞工消費者所形成的低消費零售市場，是高度競爭的，它重新束縛他們，並再生產原有的階級關係。

由此可見，「市場社會」並非一個目的論的終點，也不是一個非歷史的結構，而是農民進入工業化及城市化空間時，作出的個人、家戶及社群的應對過程，蘊含著多重實踐可能與權力關係的場域。對民工來說，所謂「市場社會」其實有兩個場域，他們作為工廠勞動市場的「打工者」，他們身處於工廠－宿舍空間，隔離於當地社會，以防止他們組成城市勞工家庭。至於逃脫工廠的民工，則形成依賴工廠勞工的零售市場，非正規經濟的參與者。前者所生產的市場社會是一個由資本所支配的工廠體制，後者是一個依賴於工業生產及勞動的非正規經濟，或所謂小商品生產及交易(*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exchange*)(Moser 1978)，它們形成了兩個互相強化及制約的「市場社會」。

本研究提出對「市場社會」的新理解，雖然無法進一步討論其政治意涵，但可對相關討論提供一些啓示。「市場」不是個人主義的空間，或帶來布爾喬亞式的公共領域，眾多的市場構成帶來不同的社會連結。不同的社會連結內有不同的權力關係、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行動者，「民工」這個範疇至少蘊含工廠勞動者以外的可能，並不由工業資本所決定的。同時，所謂「市場社會」的政治，並不一定環繞著「市場」對抗「國家」此一軸線；雖然，田野考察裡看不到任何公開的政治行動，但從他們的日常實踐中，時時可看到他們持續抗拒及嘗試擺脫資本的權力網絡的努力。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Chatterjee, Partha (恰塔吉) 著，王智明譯。2000。〈論後殖民民主中的

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收錄於《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陳光興編，頁37-60。台北：巨流。

- 吳介民。2000。〈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中國式多重剝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頁1-44。
- 馬傑偉。2003。《酒吧工廠：打造現代身體》。香港：苗苗堂有限公司。
- 秦暉。2003。〈關於小農問題的歷史考察〉，收錄於《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項飏。2000。《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聯書店。
- 廣東省統計局。2006。《廣東省統計年鑑》。北京市：中國統計出版社。
- 劉小楓。2001。〈導讀〉，收錄於《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Georg Simmel（齊美爾）著，劉小楓選編，頁i-xxii。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二、英文書目

-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Public Culture* 2(2): 5-20.
- Borden, Iain. 2001. "Another Pavement, Another Beach: Skateboarding and the Performative Critiqu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Unknown City: Contesting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Space*, edited by Iain Borden, Joe Kerr, Jane Rendell and Alicia Divar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Burawoy, Michael.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ntempor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31(2): 193-261.
-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 Chamberlain, Health B. 1993.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n *Modern China* 19(2): 199-215.
- Chan, Anita and Hong-Zen Wang. 2005.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Workers' Conditions – Comparing Taiwanese Factories in China and Vietnam,"

- in *Pacific Affairs* Volume 77, No. 4 (Winter 2004/ 2005): 629-646.
- Cheng, T. J.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in *China Quarterly* 139: 644-668.
- Clifford, James. 1997. *Routes :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agg, Mike.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avis, Deborah 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1995.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aser, Nancy. 1989.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Habermas and Gender," in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Social Text* 25/26: 56-80.
- Gans, Herbert.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by Quintin Hoar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 Hall, Stuart. 1994[1980].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Culture/ Power/ 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reven, T. K. 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t, Keith.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i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1: 61-89.
- Harvey, David. 1989a.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 1989b.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and Michael H. Reed. 199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An Ideological Analysi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9(4): 465-496.
- Katznelson, Ira. 1992. *Marxism and the C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ndes, Joan B. 1988.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febvre, Henri.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 1973. "Some Perspectives on Urbaniz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xico City," in *Urban Anthropology: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Urbanization*, edited by A. Southall, pp.125-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pietz, Alain.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 Mazumda, D. 1976.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 4: 655-679.
- McGee, T. G. 1973. "Peasants in Cities: A Paradox, a Paradox, a most Ingenious Paradox," in *Human Organization* 32: 35-42.
- Mingione, Enzo. 1988. *Fragmented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orley, Davi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oser, Caroline N. 1978.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In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in *World Development* 6: 9-10.
- Negt, Oskar and Alexander Kluge. 1993.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oble, Trevor. 1998. "Postmodernity and Famil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9(3): 257-277.
- Pahl, R. E. 1983. "Concepts in Contexts: Pursuing the Urban of 'Urban' Sociology," in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edited by Sutcliffe, Anthony and Derek Fraser, pp. 373-382. London: Edward Arnold.
- Pahl, R. E. and Claire Wallace. 1985. "Household Work Strategies in Economic Recession," in *Beyond Employment: Household, Gender and Subsistence*, edited by Nanneke Redclift and Enzo Mingione, pp. 189-227.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ark, Robert E., Ernest W. Burgess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1925.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ennifer.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we, William T. 1984. *Hankou: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9. *Hankou: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t, Victor F. S. and Chun Yang. 1997. "Foreign-Investment-Induced Exo-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 *Urban Studies* 34(4): 647-677.
- Solinger, Dorothy J. 1991. *China's Transients and the State: A Form of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omers, Margaret. 1993.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5): 587-620.

- Strand, David. 1995. "Conclus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Richard Kraus, Deborah S. Davi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pp. 394-4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dward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akeman, Frederic. 1993.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9(2): 108-138.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s, Paul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England: Saxon House.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7): 1-24.
- Zhang, Li. 2001.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